



## 一介书生投笔行

○杨良源（1951届土木）

1946年，我从上海的江苏省立上海中学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在土木系学习期间，我参加过进步学生社团“炼社”“星火壁报”的活动。1947年12月，经土木系教师胡东明（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公路局总工）、杨鸣岗（解放后任北京建工局领导）介绍加入了地下团组织。1948年3月，在他们引导下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10月，我接到党内联系人储传亨的通知，从而离开北京到了位于河北泊镇的城工部，在那里工作了半年。记得我与另外三位同志一起，花了很长时间整理天津市地下党关于工会组织的资料。其中一位是清华的同学吴勤娟，她后来改名叫陈莹。

1949年4月，我回到已经解放的北平，工作单位是长辛店工会工作组；不长时间后又调到北京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



1948年春，部分土木系同学在气象台附近合影。左起：李斌、张仁、温益友、杨良源、艾知生、沈恒泽、钮友杰、张有实

为了经济建设需要，国家要求学理工的返校学习，于是在1949年9月，我再次回到清华土木系继续学习，与1947级同学一起在1951年完成学业。

### 参军入伍

1951年6月，我们应届毕业生参加全国统一分配，在填写志愿时，多数同学填写的是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清华党总支决定建立一个毕业生临时党支部，指定支部书记是黄庆华，我是宣传委员。6月下旬公布了工作分配名单，分配我到华北行政委员会。实际上，党总支组织委员周维垣同志通知我和黄庆华、王尔康三个人，拿了总支开出的介绍信（包含党组织关系介绍信）直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到，中央组织部直接介绍我们到军委联络部工作。这次调动没有联系北京市委组织部和中央军委总干部部，而是直接调到基层工作。

军委联络部政治部干部处处长接待我们，叫我们住到他们的招待所。干部处的干事给我们每人一份提纲，要求非常详实地写自传。自传收走三天后，由领导当面谈话询问。在八一建军节前两天，让每人填一份参军入伍申请表，上报经批准后，7月27日给我们发了整套军人的被服。7月29日将我们接到了机关里各自的办公室和宿舍，并在当晚参加了庆祝八一的纪念大会。

我被分配在一局二处，黄庆华和王尔



大学一年级时在西操

康被分配在一局一处。我们每天按照作息时间去工作、生活。早晨出操时，为了让我们三个大学毕业生的动作合乎标准，我们经常被叫出列进行单独训练，做到立正、稍息、向后转整齐划一。我们不能丢失清华精神，做得特别认真。同时，我们也养成了严格准确要求自己的习惯，终身受用。

单位里的工作是由领导安排，我们之间互相不联系，不交流，只向组织负责。这种严格的保密要求，让我养成了不乱说乱动的习惯。

工作中需要我去了解一些情况，向一些部级领导、科学家咨询。我曾经访问过李四光、范长江、钱三强、吴新谋、王淦昌，他们都非常平易近人，没有领导的架子。尤其是我找王淦昌时，把一篇有关检测核能仪器说明书的译文给他看，他没有说什么批评责备的话，而是拿起笔来从头至尾认真改了一遍。因为我学的是土木工程，把一些物理学方面的名词和连带的副词都翻译错了，等于他重新翻译了一遍。他的做法和精神，让我终身难忘。

1952年，社会上刮起科技人员归队的

风，就是科技人员应该做技术研究工作，不做行政管理等工作。我考虑想去做技术工作，得了薪金供养母亲。领导批准了我转行归队，介绍我到总干部部下属的管理处。处里干事介绍我去通讯兵部，他们正需要人员修建兵部机关大楼、宿舍等。我提出要去铁道部，处长与我谈话，我还坚持己见。接着，干事说将由部长直接和我谈话。

我对军队和军委机关知之甚少，所以连部长姓名都不知道，干事也没有跟我讲明白。部长见我后就指着桌上我的自传说：“我看了你的材料，你是挺好的同志。我们部队建设也是非常需要科学技术的，希望你还是留在军队中发挥作用。”我听了以后，觉得他没有用共产党员必须按党的要求绝对服从的观念来向我施压。我想，顾不了养我老娘了，那就去铁道兵部队吧。后来我从军委的机关和领导那里了解到，与我谈话的是赖传珠部长，可见我这人当时有多狂。

黄庆华刚好赶上中央军委组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他在陈赓大将当院长兼政委的哈军工里参加教学工作，后担任机械教研室主任。后来，他调到在西安成立的装甲兵工程学院，后又调任北京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所科技处。他在担任装甲兵工程学院院长任上离休，对装甲兵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王尔康同志离开了军队系统，在国家旅游总局常务副局长任上去世。

### 加入铁道兵团，赴朝参战

1952年11月，我在北京铁道兵团留守处那里领到一张铁路免票，带一个手提包，背一床棉被，将许多书籍用品存放在

清华战友那里，带了军委总干部部的行政介绍信和组织关系介绍信，独自一人踏上了路途。经一路签证，经沈阳到了丹东铁道兵团留守处转运处，叫我等，有车即安排去前方兵团总部。每天两顿饭，过了一天通知我，第二天晚饭后出发去前线。

那天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说有一个车队去前方，叫我坐上一个装满木箱的大卡车，车上司机和助手在驾驶舱里，我坐在驾驶室后车厢第一排箱子的中间空挡里。

前面一辆车是敞篷车，车上都是女同志。车过了鸭绿江后不久停下来休息，前面车上一个战士拿了一件棉大衣给我，说前面车上的一位领导叫我穿上，看我一身解放军的棉衣太薄，挡不住朝鲜的寒夜。汽车走走停停，遇见敌机投照明弹时立即熄火停下。天快亮时到达了部队驻地，给我送棉大衣的战士来把大衣收回去，我才知道那是铁道兵团第二师机关的女同志。给我大衣的女同志是该师一位领导的夫人，是个机关干部，至今我也不知道她是哪一位，但我深深地感受到，这就是纯真的阶级友爱。我问了司机，那车上装的箱子里是什么物品，他说那是硝酸铵。我想难怪我上车时，他们说若遇敌机扫射或轰炸，必须赶快跳车。

我到志愿军铁道兵团政治部报到后，被分配到第三师，师政治部干部科确定我去施工技术处技术科工作。

美帝国主义日夜破坏朝鲜的铁路，阻断对前线作战部队的弹药和生活物资供应，几乎炸断了所有的铁路桥梁。铁道兵采取了两种方法来保持铁路的畅通，一是在破坏的桥梁外围起石块筑成基础，在上面立起木排架，在排架上架起工字钢，就可以恢复通车了。二是在正桥的上游，用

同样的材料和方法修起一座便桥，然后与正线连接起来。

为了准备应对帝国主义的扩大战争，铁道兵团第三师调到京义线和平北线，承担两线的铁路保障任务。平北线北端就是鸭绿江水电站，一条九曲川蜿蜒当地，由此修建了不少桥梁。从一个隧道出来跨过九曲川修一座桥梁，再经过一个桥梁，进入下一个隧道。为了防止桥梁被炸切断交通，决定修建两条跨越第一、二、三、四九曲川桥梁的便线。我参加了整个工程的勘测设计工作，并负责一条便线的施工技术工作。为争取时间我们昼夜施工，因为技术人员只有我一人，每当完成一部分工程，我都要在小战士配合下去测量验收，才能再继续施工。我有四天是昼夜值班在工地上。衣鞋单薄，我脚后跟都起了很多冻疮，还要时刻小心敌机的轰炸。由于任务完成得出色，师里给我记了三等功一次。

1953年二三月份，在龟城那次最为惊



杨良源在朝鲜

## □ 回忆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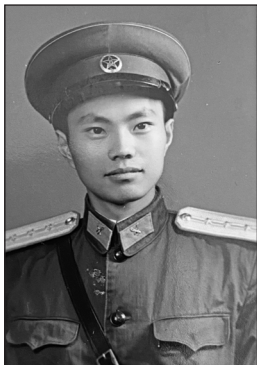
险。一座桥被炸坏正在修复，我们两人被派去测便线，正在工作时便听到美军的飞机呼啸而来，俯冲向我们的工地，还扔下两枚炸弹。因为距离太近了，我清楚地看到了飞行员的脸。接着他们又用机枪进行了扫射。好在我们两人及时躲到一条沟里，人安全无恙，我手里的经纬仪也完好无损，助手的花杆周围被机枪扫过但也没损坏，好不惊险！

### 从鹰厦铁路转战襄渝铁路

1954年，部队回国到陕西华县休整，党中央决定将铁道兵团改为中央军委下属的一个兵种——铁道兵，并由王震同志任司令兼政委。原定要去参加修建宝成线，后因国内外形势需要，确定进军东南，抢建鹰厦铁路。

我们铁三师进驻鹰潭，后驻福建漳平，参加修建鹰厦线第一工程段和第九工程段的施工，完成了第九、第十、第十一工程段的收尾工作。1960年11月，部队进驻湖南芷江，负责湘黔线第二工程段的施工。1961年10月，部队调到江西抚州市，修建向塘到乐平的铁路专用线，是开采铀矿的铁路。1962年5月，部队调驻吉林白城子，去修建东北林区的铁路和公路，师部迁至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1959年，在修建鹰厦线时，因工作成绩突出，我荣立一次三等功。我在清华学的是土木工程设计，在修建鹰厦线时承担的是施工计划工作。每当去完成一项工程任务时，部队都是按照当时的建制派一个连、一个排去施工，常常出现工程量大小与人员数量不匹配的状况，劳动效率不高。为此，我建议采取定额制，即在制定施工计划时比较精确地确定工程量需要的



军衔  
杨良源学长被授予上尉  
(一九五六年摄)

人力，然后再安排相应的人去。这样一来，劳动效率大大提高，领导表扬我计划做得好，给我记功嘉奖。

鹰厦铁路修建部队机械化程度低，线路的路基土石方都是由大量当地的民工在部队同志指导下肩挑手抬，把一筐筐土石方填起来，用人工打夯的办法，修成坚实的铁路路基。对隧道施工与石方工程，都是人工打钢钎，把坚硬的石头砸出窟窿，在里面放入炸药引线，然后点燃导火索，把石头炸出路堑，变成一个隧道或形成路基。由于高强度的劳动，管理又不够审慎的地方或遇天灾，许多民工兄弟和指战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昆铁路沿线的烈士陵园里，铁道兵指战员的人数相当于铁道兵一个团。在祖国社会主义基本建设中，军人和老百姓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1963年8月，我被调到铁道兵团司令部技术处；1965年8月，被调到司令部作战处作战科。铁道兵设立科研处，接着建立研究所，开展掘进隧道的掘进机的研究和舟桥的研究和使用。我参加了组织派遣铁道兵部队去抗美援朝的工作，同时还组织铁道兵各师和各大军区合作，编制全国铁路的备战计划。

“文化大革命”中的1969年7月，我

因解放前参加过北京市党的地下组织而被停职，调至湖北襄北铁道兵五七干校当学员。在劳动中，我学会了对桃、梨、葡萄等果树的修剪嫁接等管理技术。1971年9月14日，我离开干校，被调到陕西紫阳县铁道兵第二师司令部作战科，参加襄渝铁路的修建施工。

1976年6月，组织考虑到我右眼患了严重的疾患——视网膜脱落，当地无法医治，把我调到河北省新城县（高碑店）铁道兵科学技术研究所科技处工作。1981年，铁道兵科研所迁入北京市大兴区，之后我又调任情报研究室副主任。

### 转业地方 为民服务

1983年，铁道兵兵种撤销，集体转业成为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原来的十一个师改编成第十一到第二十一工程局。当时规定，50岁以上的同志大多数都不再转业去工程公司，就地离退休。我已经55岁了，经过上级批准，我们建立起新建铁路工程技术咨询公司设计室，挂靠在国防科工委健康工程设计所和化学工程公司北京重机公司设计研究所下面，为此我还自学了上下水、水暖等设计知识。设计室为大兴区前后设计了30个工程项目。1983年9月至1988年8月，清华老同学张其锟邀请我参加了他主持的北京航空遥感工作。

1986年起，我参加了北京市离退休科技工作者协会的工作。这是北京市科协下面一个组织离退休科技人员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组织，分机械、土建、教育等10个委员会，协会人员多达千余人，做了大量科技服务、咨询工作。我在1988年被选为协会理事、组宣委员会主任，1992年被选为常务理事，聘为副秘书长，这项工作一直干到1995年。

我离休后的生活也是多姿多彩的，我参加过总政治部玉泉路老干部管理局组织的老干部大学，学习书画、社科、文史等内容，让我担任大兴干休所的学习班长，还参加了大兴区老干部大学的电脑班、诗词班、剪纸班，算是老有所乐。在我80岁时，写过一首诗，抄录在此与大家共勉：

#### 八十自述

一介书生投笔行，两袖清风为人民。  
三生有幸逢盛世，四体勤劳健身心。  
五官端正无斜视，六根清净不爱金。  
七窍开通辨真伪，八旬年少网上巡。  
九州风云皆知晓，十足狂傻觅佳吟。



2004年10月，清华土木系老同学聚会。前排左起：钮友杰、沈恒泽、张继先、王庸勤、储传亨、杨良源，后排左起：庞文弟、张有实、刘惠群、丁培良、郑宝理、黄宗焯、魏耀荣